

异质性特征视角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 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

王岩,王亚迪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经济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数字普惠金融将数字技术融入传统金融业务,拓展了金融业务的深度与广度,并对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产生了深远影响。基于 42 家商业银行 2011—2022 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异质性特征视角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商业银行信用风险;(2)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效应存在维度、地域、股权结构等异质性特征。因此,在数字普惠金融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金融监管部门应鼓励商业银行进一步完成数字化转型,不断完善风险管理机制。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信用风险;商业银行;金融风险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5.03.009

文章编号:2096-9864(2025)03-0075-09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3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1],抓好防范和化解商业银行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金融风险这一关键点尤为重要。2025 年全国金融稳定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及时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 and 外部冲击。在现代金融系统中,商业银行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信用风险管理对于防范现代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至关重要。防范系统性风险首先应当控制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因此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控是当前金融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商业

银行信用风险影响因素、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和各因素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例如,张海亮等^[2]分析了金融部门债务风险的传导过程,发现商业银行信贷分布能够影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姚婷等^[3]通过实证分析得出金融科技能够通过降低交易的信息成本来减少信用风险的发生;李朝辉等^[4]采用修正后的 KMV 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对于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其影响信用风险的因素存在差异。

21 世纪以来,数字经济以迅猛之势发展或为助推全球经济发展的主力之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4 年)》指出,2023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

收稿日期:2024-02-2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1CJL012);河南省软科学研究项目(252400411169);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2024GGJS095)

作者简介:王岩(1987—),男,河南省商丘市人,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农村金融、农业经济;王亚迪(2000—),女,河南省洛阳市人,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数字金融。

53.9万亿元,占GDP的比重提高至42.8%,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促进经济稳定、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5],体现出中央层面对数字金融、普惠金融的高度重视。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与传统的普惠金融服务相融合,使得商业银行之间竞争日趋激烈,给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带来了冲击。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研究相对较少,且结论存在差异。例如,张龙耀等^[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农商行受金融科技的影响会倾向于由担保贷款向信用贷款调整,从而降低农商行的信用风险。杜莉等^[7]认为数字金融本质上是基于技术进步的一种金融创新行为,能够通过强化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防控能力降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发生率;傅顺等^[8]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存在“倒U形”关系,并且在非“中农工建交”五大行中,这种“倒U形”关系更为显著。

通过梳理上述文献,可以发现,在已有研究中,关于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尚未形成定论,且多集中在数字金融与金融科技等方面。区别于以往研究只考察数字金融对银行业风险的整体作用,本文拟着重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同时,在考虑异质性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的异质性特征,以期对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助力商业银行发展提供参考。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融合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服务,对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产生了一定影响。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普及加剧了金融市场的竞争。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降低了交易成本^[9],使得新兴金融科技企业凭借成本优势挤占部分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与利润空间,迫使一些商业银行冒风险去获取收益^[10]。高回报往往与高风险挂钩,商业银行追求更高利润会影响其风险偏好从而增加其信用风险。例如,商业银行为了吸引和保留客户,可能会放宽信贷标准,这会在短期内增加其信用风险。

其二,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更好地控制信用风险。资金供求双方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供应方不能很好地识别需求方的经营情况和资信状况,而资金供应者则要支付监管成本来对信贷需求方的状况进行确认,从而导致了金融摩擦。数字普惠金融服务通过技术创新缓解了交易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帮助商业银行更有效地收集和分析个人客户的财务数据,从而更好地评估信用风险,还可以帮助商业银行更及时地监测到个人客户的信用变化,从而采取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以降低信用风险。例如,云计算和大数据等工具能够帮助商业银行高效整合分析大量的客户交易信息和行为信息,精准判断客户的信用水平,缓解银行与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11],提高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能力^[12]。

其三,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带来了技术创新,一定程度上能够克服传统金融业务的限制,帮助商业银行完成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有正向促进作用^[13],能够提高商业银行的服务效率和技术水平,帮助商业银行判断客户信贷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另一方面,蚂蚁金服等金融科技公司与商业银行在数字普惠金融业务领域展现出互补性,为商业银行带来了金融产品创新。商业银行利用自身的资金优势和监管经验,与金融科技公司的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创新相结合,促进了金融产品的创新,商业

银行可以设计更多与客户信用状况相匹配的产品,从而降低违约风险。许多商业银行已经与金融科技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通过合作提供更多元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其四,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平台通常提供金融教育和理财工具,有助于提高客户的金融素养,减少因客户缺乏金融知识而对商业银行造成的信用风险。例如,蚂蚁金服的“蚂蚁财富”、腾讯的“理财通”等通过文章、视频等形式普及金融知识,帮助客户加深了对金融产品的理解,增强了其风险意识和理财能力,有助于减少银行客户的违约行为,降低银行的信用风险。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1a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升商业银行信用风险。

假设 1b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降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

2. 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影响的异质性特征

数字普惠金融是数字技术和传统普惠金融相融合的产物,其发展水平和效能受数字化程度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备程度的制约,一定程度上影响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管理效果。其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是多维度的,不同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具有显著差异,从而导致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存在多维度异质性。其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我国地域辽阔,各省份经济发展程度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同样体现在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程度上。经济发达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相对于经济落后地区更加完善,数字普惠金融的规模效应也更明显,该地区客户更容易接受数字普惠金融这类新型金融服务模式,因此可导致区域异质性的存在。其三,由于股权结构类型的不同,商业银行的数字化程度、经营目标等也有所不同。例如,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规模较大,

资金充足,能够投入大量资本用于数字化建设,数字化程度较高;而普通民营商业银行在技术资金投入上不如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其数字化程度也相对较低。另外,股权结构也会影响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14]。这些差异可能导致股权结构异质性的存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2 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存在维度异质性。

假设 3 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

假设 4 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存在股权结构异质性。

二、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设计

1. 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的完整性和可得性,本文以国泰安数据库、各上市银行的年度报告为基础,选取 42 家上市商业银行作为样本数据,研究区间为 2011—2022 年,样本量能够较好地反映上市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情况。为避免缺失值和异常值对实证结果造成偏误,本文剔除了部分数据缺失样本,并采用插值法补充缺失数据。数字普惠金融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与蚂蚁集团联合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2. 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商业银行信用风险(*RISK*):指由于债务人不能按时偿付所欠的债务而使债权人蒙受损失。具体包含两个层面:第一,借款人在主观上不愿意归还本金与利息;第二,借款人由于自身信用等级的下降或其他意外事件的发生,使得债务契约的价格发生溢价的可能性。目前学界已有文献主要选取不良贷款率^[15]与贷款拨备率^[15]等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进行衡量,由于贷款拨备率数据部分缺失,本文选取不良贷款率

来衡量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程度,其数值越大,代表商业银行所承担的风险越高。

(2)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DF*):参考张中祥等^[16-18]学者的做法,选取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与蚂蚁集团联合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衡量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该指数覆盖范围广、指标选取全,可以较好地反映出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进程与未来趋势。

(3)控制变量

本文参照已有研究的做法,从银行自身角度,控制了资本充足率(*CAP*)、非利息收入占比(*NION*)、成本收入比(*CIR*)、净资产收益率(*ROE*)、净息差(*NIM*)、资产负债率(*ALR*)、存贷比(*LDR*)等可能影响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变量;从地区经济发展角度,控制了GDP累计同比增长率(*GDP*)、CPI累计同比增长率(*CPI*)等其他可能影响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变量。变量选取与具体定义见表1。

3. 实证模型设计

为验证所提假设,本文采用面板模型进行研究,构建模型如下:

$$RISK_{it} = \alpha_0 + \alpha_1 DF_{it} + \varphi X_{it} + v_i + u_{it} \quad \textcircled{1}$$

其中,*i*为具体银行,*t*为时间;*RISK*为被解释变量(不良贷款率);*DF*为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X*为控制变量集,*v_i*为控制个体

固定效应,*u_{it}*为随机误差项, α_0 为截距项。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1. 描述性统计

本文样本涵盖42家上市商业银行,分别对各个变量的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具体结果见表2。除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外,其余变量均以百分比表示。由表2可知,所选的42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的标准差为0.578,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9.560、0.220,相差较大。本文用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衡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其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460.691、18.470,标准差为114.266,说明不同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需要进一步分析地区间差异。

2. 基准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见表3,表3中列(1)至列(3)分别使用不同方法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关系进行检验,其中列(1)运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分析,列(2)为固定效应模型(FE)回归分析,列(3)是随机效应模型(RE)回归分析。由回归结果可知,三种模型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回归系数分别为-0.002 05、-0.002 38、-0.002 13,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降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即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能够得到

表 1 变量选取与定义

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计算
被解释变量	商业银行信用风险	<i>RISK</i>	贷款损失准备/贷款总额
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i>DF</i>	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
控制变量	资本充足率	<i>CAP</i>	资本总额/风险资产
	非利息收入占比	<i>NION</i>	非利息收入/营业收入
	成本收入比	<i>CIR</i>	营业费用/营业收入
	净资产收益率	<i>ROE</i>	净利润/平均净资产
	净息差	<i>NIM</i>	(银行全部利息收入-银行全部利息支出)/全部生息资产
	资产负债率	<i>ALR</i>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存贷比	<i>LDR</i>	贷款总额/存款总额
	GDP 累计同比增长率	<i>GDP</i>	当期 GDP 累计总额-基期 GDP 累计总额/基期 GDP 累计总额×100%
	CPI 累计同比增长率	<i>CPI</i>	当期 CPI 累计总额-基期 CPI 累计总额/基期 CPI 累计总额×100%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值
商业银行信用风险	<i>RISK</i>	1.295	0.578	0.220	9.560	504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i>DF</i>	276.776	114.266	18.470	460.691	504
净息差	<i>NIM</i>	2.456	0.559	1.250	4.714	504
净资产收益率	<i>ROE</i>	14.448	4.692	4.464	31.786	504
资本充足率	<i>CAP</i>	13.472	1.722	8.840	24.860	504
存贷比	<i>LDR</i>	72.245	14.493	26.430	116.235	504
非利息收入占比	<i>NION</i>	18.869	10.323	-14.625	51.090	504
成本收入比	<i>CIR</i>	31.206	6.051	18.930	66.470	504
资产负债率	<i>ALR</i>	92.866	1.346	83.471	97.827	504
GDP 累计同比增长率	<i>GDP</i>	7.244	2.706	-0.200	16.400	504
CPI 累计同比增长率	<i>CPI</i>	2.338	1.069	0.900	5.400	504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OLS	(2) FE	(3) RE
<i>DF</i>	-0.002 05*** (0.000 55)	-0.002 38*** (0.000 62)	-0.002 13*** (0.000 56)
<i>LDR</i>	0.004 32* (0.002 49)	0.004 70 (0.003 38)	0.003 71 (0.002 76)
<i>CAP</i>	-0.023 22 (0.020 11)	-0.057 66** (0.022 47)	-0.042 86** (0.020 75)
<i>CIR</i>	-0.004 60 (0.004 60)	-0.002 17 (0.007 22)	-0.003 28 (0.005 39)
<i>ALR</i>	0.014 29 (0.033 50)	0.032 21 (0.040 27)	0.014 01 (0.035 75)
<i>NION</i>	0.001 58 (0.003 34)	0.003 66 (0.004 05)	0.002 66 (0.003 57)
<i>NIM</i>	0.105 83 (0.074 62)	-0.047 31 (0.083 85)	0.024 72 (0.076 68)
<i>ROE</i>	-0.077 04*** (0.009 87)	-0.094 47*** (0.011 36)	-0.085 06*** (0.010 31)
<i>GDP</i>	-0.006 92 (0.013 69)	0.011 03 (0.013 32)	0.004 26 (0.013 11)
<i>CPI</i>	-0.073 96** (0.031 98)	-0.048 98 (0.030 15)	-0.057 85* (0.030 05)
<i>_cons</i>	1.727 29 (3.303 80)	0.915 78 (3.963 17)	2.217 47 (3.515 91)
<i>N</i>	504	504	504

注：***、**、* 分别表示 $P < 0.01$, $P < 0.05$, $P < 0.1$, 括号内为标准误差,下同。

缓解,印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1b。可能的原因是,商业银行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分析风险数据能更加精确地判定客户的信用等级与还款能力等,有效地提高了商业银行对信用风险的识别能力,从而降低了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另外,在控制变量中,净资产收益率的回归系数均显

著为负,这意味着净资产收益率的提高,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为了保证基准回归结果的有效性,本文通过 Hausman 检验,确认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更适合本文回归分析,因此本文选取固定效应模型为本研究的适用模型。

3. 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

(1) 多重共线性检验

本文对模型采用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结果显示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各个控制变量 *ROE*、*ALR*、*LDR* 等的 *VIF* 值均小于 10,可以排除多重共线性问题,表明基准回归结果稳健。

(2) 解释变量滞后效应检验

本文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标的滞后一期和滞后两期的数据作为解释变量,尽量减少内生性问题的影响,滞后效应检验结果见表 4。表 4 中列(2)至列(3)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将工具变量“滞后一期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滞后二期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纳入回归模型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001 83 和 -0.002 69,依然为负,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反向因果偏误得到缓解后,数字普惠金融依然能够起到降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作用,验证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3)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将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三个方面的数据作为替代变量,来替代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 5。由表 5 中列(1)至列(4)的回归结果可知,在使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检验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负,说明其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降低效果依然显著,表明本文的基准回归研究结论可信。

4. 异质性分析

(1) 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异质性检验

根据表 5 列(2)至列(4)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002 88、-0.001 91、-0.000 20,且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最为显著,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次之,数字化程度对商业

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则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商业银行金融业务的影响主要通过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提升得以实现。数字普惠金融覆盖程度越广,其用户数量和占比越高,商业银行的客户数量也会随之增加;使用深度是由实际使用金融服务的人数及其活跃程度等指标进行衡量的,随着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的提升,用户的金融素养一定程度上也会得到提升,从而提高了商业银行客户质量,一定程度上促进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效率的提升,从而能够减少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事件的发生。而数字化程度主要影响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其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并不显著。基于以上分析,假设 2 得到验证。

(2) 地域异质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地区商业银行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本文考虑经济发展水平与资源禀赋等情况,参照李菲菲等^[19-20]的研究进行地域异质性检验,将我国的经济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进行地域异质性分析,地域异质性检验结果见表 6。

由表 6 可知,数字普惠金融系数依然显著为负,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促使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显著降低。进一步对比可以发现,东部地区回归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中部和西部则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东部地区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作用更为明显。可能的解释是:东部地区凭借良好的环境优势,经济增长较为稳定,金融生态相对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

表 4 滞后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1) <i>RISK</i> <i>FE</i>	(2) <i>lnRISK</i> <i>DF</i> 滞后一期	(3) <i>lnRISK</i> <i>DF</i> 滞后二期
<i>DF</i>	-0.002 38*** (0.000 62)		
<i>lnDF</i>		-0.001 83*** (0.000 33)	
<i>ln2DF</i>			-0.002 69*** (0.000 36)
银行层面	Y	Y	Y
地区层面	Y	Y	Y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i>FE</i>	(2) <i>RISK</i>	(3) <i>RISK</i>	(4) <i>RISK</i>
<i>DF</i>	-0.002 38*** (0.000 62)			
覆盖广度		-0.002 88*** (0.000 63)		
使用深度			-0.001 91*** (0.000 51)	
数字化程度				-0.000 20 (0.000 41)
银行层面	Y	Y	Y	Y
地区层面	Y	Y	Y	Y

表 6 地域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总体	(2) 东部地区	(3) 中部地区	(4) 西部地区
<i>DF</i>	-0.002 38*** (0.000 62)	-0.002 31*** (0.000 67)	-0.004 42* (0.002 41)	-0.001 96* (0.001 06)
银行层面	Y	Y	Y	Y
地区层面	Y	Y	Y	Y

善,数字化程度更高。基于较高水平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商业银行在利用先进数字技术进行客户数据收集与分析时具有优势。同时,较为发达的经济环境和数字技术也培育出大量优质企业,提升了商业银行的客户质量,使得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机制具有规模效应,提高了风险监管效率,从而降低了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发生的可能性。而经济发展水平偏弱的中部和西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数字化程度也相对较低,优质企业少于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受到自身技术与客户质量双重限制,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作用不如东部明显,存在区域异质性。基于以上分析,假设 3 得到验证。

(3) 股权结构异质性检验

为深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作用是否存在股权结构异质性,本文参照周鹤峰^[21]的研究,进行股权异质性检验,将所选取的商业银行样本按照国有持股比例结构划分为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国有参股商业银行和民营商业银行 3 大类进行分组检验,股权结构异质性检验结果见表 7。由表 7 中列(1)至列(4)的回归结果可知,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回归系数依然为负,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显著降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对比表 7 中列(2)至列(4)可以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国有参股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影响更大,对民营商业银行的影响次之,对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影响则并不显著。这主要是由于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相对来说规模较大、业务管理更规范、创新能力更强、信用风险管理水平较高,因此数字普惠金融的边际效用对其信用风险管理影响较小;而国有参股商业银行业务管理和创新能力相对较弱,因此数字普惠金融的边际效用更强。另外,由于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受政府管制和政策限

制,再加上其成立时间较早,管理经验丰富,相对来说风险偏好更加保守,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对其信用风险的降低作用不如国有参股商业银行显著。相较于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和国有参股商业银行,民营商业银行规模较小,且经营范围和客户数量有限,其本身风险管理水平和创新能力不足,限制了信用风险水平,使得数字普惠金融所带来的边际效用被放大化,从而导致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大于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以上结论与本文上述理论分析相符合,假设 4 得到验证。

表 7 股权结构异质性检验结果

	(1)	(2)	(3)	(4)
变量	总体	民营商业 银行	国有参股 商业银行	国有控股 商业银行
DF	-0.002 38*** (0.000 62)	-0.002 52* (0.001 49)	-0.003 27*** (0.000 67)	-0.000 18 (0.000 75)
银行层面	Y	Y	Y	Y
地区层面	Y	Y	Y	Y

四、结论与建议

1. 研究结论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全新的金融服务,推动着银行业的改革和发展。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发现:其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总体上会降低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其二,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降低作用,存在维度、地域、股权结构等方面的异质性特征。在维度方面,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最为显著,使用深度次之,数字化程度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则不显著;在地域与股权结构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地区商业银行与国有参股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金融监管部门应对中西部地区与民营商业银行重点关注,鼓励商业银行进一步完成数字化转型、不断完善风险管理机制。

2. 对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其一,应当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等多个维度,全面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尤其是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的发展。另外,商业银行应认识到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从合作、投资、创新等方面着手,制定并调整自身数字化发展策略,以应对市场竞争带来的风险。

其二,商业银行应完善其风险管理体系,并建立完善的预警管理机制,完善风险预警管理的内在保障,以保证各项重大风险管理措施的有效实施,从而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安全性,以应对信贷风险。

其三,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应当因地制宜,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应当继续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创新技术,充分利用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效应;中西部地区则应该着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商业银行数字化水平。

其四,国有参股商业银行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紧跟当地产业发展方向和政策走向,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手段加强信用评估,并及时预警风险,继续将信用风险保持在稳健水平;民营商业银行应加快信用风险管理的数字化转型,主动与数字金融企业合作,从而增强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实现信用风险管理的优化与升级。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重大问题[J]. 求是, 2023(4): 1-2.
- [2] 张海亮, 叶群, 王海军. 债务风险累积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形成[J]. 金融论坛, 2018, 23(9): 26-28.
- [3] 姚婷, 宋良荣. 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经济资本影响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 2021, 41(1): 107-109.
- [4] 李朝辉, 张明洁, 杨帆, 等. 基于修正 KMV 模型

的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研究[J]. 金融发展研究, 2023(7): 89-92.

- [5] 唐建伟, 邓宇. 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解读 2023 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J]. 新金融, 2024(1): 25-26.
- [6] 张龙耀, 袁振. 金融科技会影响农村金融机构贷款的信用结构吗[J]. 农业技术经济, 2022(10): 11-17.
- [7] 杜莉, 刘铮. 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约束与经营效率的影响[J]. 国际金融研究, 2022(6): 78-85.
- [8] 傅顺, 裴平, 孙杰. 数字金融发展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 来自中国 37 家上市银行的经验证据[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5(1): 149-153.
- [9] 卫晓锋. 数字普惠金融的风险与监管[J]. 金融理论与实践, 2019(6): 49-50.
- [10] 屈静晓. 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影响分析[J]. 中国管理信息化, 2023, 26(9): 87-88.
- [11] 杨竹清, 张超林. 数字普惠金融与银行信贷关系研究: 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实证研究[J]. 当代经济管理, 2021, 43(6): 79-80.
- [12] 邱晗, 黄益平, 纪洋. 金融科技对传统银行行为的影响: 基于互联网理财的视角[J]. 金融研究, 2018(11): 18-19.
- [13] 潘敏, 张依茹. 宏观经济波动下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研究: 基于股权结构异质性的视角[J]. 财贸经济, 2012(10): 63-65.
- [14] 王晓, 李佳, 李梦艺. 政策因素下资产证券化能否降低银行信用风险? ——以中国银行业为例的实证检验[J]. 商业研究, 2019(9): 87-95.
- [15] 谢太峰, 王蕴鑫, 徐子麒. 我国城市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 征信, 2020, 38(6): 79-83.
- [16] 张中祥, 胡雅慧.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家庭过度负债? ——基于主客观双重视角的微观证据[J]. 经济学(季刊), 2024, 24(2): 643-660.

[17] 吕淑丽,郝如钰,杜阳冉. 河南省绿色金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及其形响机制[J]. 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4(4):42-52.

[18] 张琼,张雨晗.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证分析[J].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23,39(5):51-64.

[19] 李菲菲. 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效应分析: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4(6):59-60.

[20] 陈阿兴,谢敏. 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

素分析:基于省际面板数据[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3(5):56-63.

[21] 周鹤峰. 宏观经济波动、银行异质性与商业银行信贷行为:来自中国银行业微观数据的证据[J]. 金融发展评论,2018(10):134-136.

[责任编辑:刘凤霞 张省]



引用格式:王岩,王亚迪. 异质性特征视角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6(3):75-83.

(上接第 35 页)

[10] 耿介. 敬恕堂文集[M]. 梁玉玮,孙红强,陈亚,校点.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11] 耿介. 嵩阳书院志·辅仁会约[M]. 康熙四十年增修本.

[12] 官嵩涛. 嵩阳书院[M].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15.

[13] 脱脱,等. 宋史:第 36 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14] 高令印,陈其芳. 福建朱子学:序[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1.

[15] 游志开. 游定夫先生集:卷首[M]. 清同治六年(1867)版本.

[16] 游酢. 游鴈山集:卷二[M]//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 3. 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151.

[17] 郑永扣. 思想、文化、道德的凝结:嵩阳书院的地位与作用[N]. 光明日报,2012-06-15(11).

[18] 潘富恩,程颢 程颐[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7:152.

[责任编辑:毛丽娜]



引用格式:吕晓洁. 嵩阳书院与儒家文化精神的重构、传播及其当代启示[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6(3):29-35.